

论长篇小说《日瓦戈医生》的宗教神性伦理

Religious Ethics of Divinity in *Doctor Zhivago*

孙磊 (Sun Lei)

内容摘要: 与苏联时期的很多作家不同, 帕斯捷尔纳克创作的最终旨归不是书写政治与社会变革, 在长篇小说《日瓦戈医生》中他没有站在对现实问责的叙事立场上, 而是采取了一种独特的价值伦理——神性伦理, 并以此来对抗时代的意识形态政治伦理。作家认为, 基督教精神确立的信仰经验、文化秩序和价值体系应该成为时代和民族的话语准则和行为规范。弘扬并发展俄罗斯经典文学的这一核心伦理观, 让文学的价值判断从现实俗世走向超验的灵魂叩问和永恒追求, 这是帕斯捷尔纳克的小说叙事中最具信仰感与永恒意义的伦理价值所在。小说的这一伦理价值观体现在三个方面: 宗教节日的文化坐标, 天启、神示的生命与大自然意象以及小说中自始至终充溢着的深邃的“复活”意识。

关键词: 《日瓦戈医生》; 宗教神性伦理; 生命意象; 大自然意象; 复活意识

作者简介: 孙磊, 文学博士, 北京外国语大学俄语学院教师, 主要从事俄罗斯文学研究。

Title: Religious Ethics of Divinity in *Doctor Zhivago*

Abstract: Unlike many writers during the Soviet Union period, the final purpose of the work created by Pasternak is not about the politics or social revolution. In the novel *Doctor Zhivago*, Pasternak did not stand on the narrative position of accountability to reality but adopted a kind of unique value ethics — ethics of divinity, and it was used to counter the ideological political ethics of the times. The author believes that the faith experience, cultural order and the value system established by Christianity should become the common discourse norms and codes of conduct for the times and the nation. Carrying forward and developing this core ethical concept in Russian classic literature makes the value judgment of literature leave the realistic world for the transcendental soul questioning and eternal pursuit, and this is the ethical value of the most faithful and eternal meaning in Pasternak's novel narrative. This ethical value of the novel is embodied in three aspects: the cultural coordinates of the religious festivals, apocalypse, god's life and image of nature, as well as the deep consciousness of resurrection filled in the novel from the

beginning to the end.

Key words: *Doctor Zhivago*; religious ethics of divinity; image of life; image of nature; consciousness of resurrection

Author: Sun Lei, Ph. D., is now teaching at School of Russian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Beijing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9, China), and interested in the research of Russian literature (Email: sunlei0601@bfsu.edu.cn).

任何一个小说家都有其叙事内在的道德感和伦理观，他们通过小说叙事表达对自我、他人、社会与世界的认知和价值判断。任何一部小说，归根结底都是艺术家的伦理观的形象化和叙事化。只有通过对于一个民族、一个时代的具有人类共性的遭遇和精神事件的价值伦理发现，作家才不会停留在对仅具有个案意义的“孤例”历史事件的讲述上，才能实现对人类普遍性经验与价值的揭示。与此同时，揭示并评价作家及其文学作品的思想及审美价值不能仅使用个人经验意义的价值判断，而需要放在一个历史语境中进行审视，且需要一种总体性视野，或者说人类普遍性的经验与价值判断。马尔库塞将这种人类普遍性的经验与价值称作审美超越的“基本维度”。他在《审美之维》一书中针对苏联时期强调艺术阶级属性的文学创作和批评模式时说，“艺术对现存现实的控诉，以及艺术对解放的美景的呼唤，艺术的这些激进性质，的确是以更基本的维度为基础的。艺术正是在这个更基本的维度上超越其社会决定性，挣脱既存的论域和行为领域”（马尔库塞 210）。需要指出的是，艺术叙事的基本维度并非单一，而是多重、多维、多义的。卡尔维诺在新千年新的小说叙事伦理价值说中指出，“叙事的繁复，则是一种理解的伦理，让自己陷入多维关系网，充分理解生活释解的多重性和多面性。生命的多面性正是现代伦理的终极世界〔……〕”（卡尔维诺 49）。

俄罗斯文学中存在两个叙事的基本维度——叙事的世俗维度和叙事的神性维度。所谓叙事的世俗维度是指作者认同世俗的社会道德标准，即站在功利的道德或价值立场来反映或表现现实与人生，把社会通用的价值标准当成考量和审视人生、社会事件的最终依据。持世俗视角叙事的作者往往局囿于现实功利而无法从中超脱、升华出来，他们或迎合，或抗拒现实的利害关系，让文学判断、裁定，甚至解决现实生活中的是非、对错、恩怨。与这一世俗视角相反，俄罗斯文学经典中还存在着另一个超越性维度，这个维度摈弃了功利性原则，作家用心灵良知，以宗教神性的观照来审视人的精神、灵魂。在苦难中发现希望，在罪感意识中寻求拯救，为生命树立起一个神圣的价值参照，这就是神性维度。

帕斯捷尔纳克（Пастернак Б.Л., 1890-1960）在《日瓦戈医生》（*Доктор Живаго*）中对人类社会的诸多哲学性命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而所有这些思考中始终贯穿着一种宗教意识，宗教神性伦理是其核心伦理。帕斯捷尔纳克

创作的最终旨归不是书写政治与社会变革，在长篇小说中他没有站在对现实问责的叙事立场上，而是采取了一种独特的伦理叙事——神性伦理。小说中始终隐含着一种根本性的伦理启示：基督教精神确立的信仰经验、文化秩序和价值体系应该成为民族和时代的话语准则和行为规范。需要指出的是，作家倡导的并非东正教的礼仪、礼数，而是一种“非神话化”的基督精神，一种充满爱的神性伦理。

作家在给友人的一封信中指出，其创作《日瓦戈医生》的目的“在于更突出、更恰当地把基督教的实质分解出来”（帕斯捷尔纳克，《人与事》291）。他说，“我运用了宗教象征法——给这部书增加一些温暖。书中使用了这些象征如同屋里安置了炉子，让屋里暖和一些……”（帕斯捷尔纳克，《人与事》358）。在作者的伦理思想中，宗教能给人带来心灵的温暖，它所传递的是伟大的爱的思想与精神。宗教神性伦理摒弃人类社会功利性的“革命与反革命”“是与非”的命题，将此在与曾在、将在联系起来，把叩问人的存在与灵魂永恒作为创作的终极命题。作家通过充满象征性的“基督形象”——日瓦戈对自我灵魂的剖析、对生命终极意义的追寻，表现了俄国知识分子所具有的一种宗教精神，这是帕斯捷尔纳克，也是苏联文学中坚持宗教精神血脉的作家们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文学精神的继承和发扬。回归、弘扬并发展俄罗斯经典文学的这一核心意识，让文学的价值判断从现实关怀走向超验的灵魂叩问和永恒追求，这是帕斯捷尔纳克的小说叙事中最具信仰感与永恒意义的一种伦理价值所在。《日瓦戈医生》中所呈现的这一宗教神性伦理并不抽象，它在小说中有着十分丰富和具体的叙事体现。

一、宗教节日的文化坐标

深入探究小说的叙事时间，我们会发现，小说中的历史时间只是串联小说情节的叙事表象，而宗教时间才是左右叙事时间的审美要素。小说中自始至终都延续着一个独特的宗教节日坐标，四季的更替、生活进程的发展，特别是人物生命成长的重要节点都是以东正教的宗教节日来呈现的，它被作家寄寓了众多深刻的文化意蕴，凸显了俄罗斯民族和个体存在所具有的基督教文化秩序和永恒价值。

小说是从东正教圣母节（俄历十月一日）开始叙事的：尤拉的母亲玛利亚·尼古拉耶夫娜的去世“正值圣母节的前夕”（5）¹。圣母玛利亚是给予耶稣生命的人间之母，日瓦戈的母亲与圣母玛丽亚名字的暗合绝非偶然，日瓦戈直面苦难、兼济天下的基督身份在此也有所暗喻。埋葬了母亲的第二天，少年尤拉在暴风雪恣肆的夜晚，思念亡母而难能入眠。舅舅韦杰尼亚平给他讲起基督与人类历史的故事。小说就这样由“圣母节”——这一宗教节日拉

1 本文有关《日瓦戈医生》的引文均来自帕斯捷尔纳克：《日瓦戈医生》（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下文只标注页码，不再一一说明。

开了“圣母”玛丽亚的儿子——“人间基督”日瓦戈充满苦难而不凡的人生。

母亲去世后，舅舅韦杰尼亚平带小尤拉到达喀山时也正值“圣母节”，在友人科洛格里沃夫的杜普梁卡庄园，韦杰尼亚平讲起了“信仰”“不朽”与“基督历史”，从而揭开了小说中宗教伦理的三个核心命题。自幼受到宗教熏陶的尤拉（父亲是鞭身派信徒，舅舅是个神父）在“圣母节”这个宗教节日里第一次双膝跪地，向上帝祷告：“上帝的天使，我的至圣的守护神，请指引我的智慧走上真理之路”，接着出现了叙述者的话语，“他向上天呼唤着，仿佛呼喚上帝身边一个新的圣徒”（12）。这是幼年的日瓦戈第一次意识到生命与上帝的息息相关。尤拉的第一个不无朦胧的神性意识为全书奠定了一种超越的、神性氤氲的意向和姿态。

日瓦戈成年后，小说中经常提及的一个宗教节日是“圣母升天节”。他在一战前线当战地医生时，小说中有这样一段描写：

这间阳光充足的明亮的主治医师办公室，四壁粉刷得雪白，洒满了金色秋天圣母升天节以后这段时间才有的那种奶油色的阳光。在这个季节，清晨已经让人感到微冻的初寒。准备过冬的山雀和喜鹊纷纷飞向色彩缤纷、清新明快的已渐渐稀疏的小树林。这时的天空已经高悬到了极限，透过天地之间清澈的大气，一片暗蓝色冰冷的晴朗天色从北方延伸过来。世界上的一切都提高了能见度和听闻度。两地之间的声音的传播十分响亮、清晰，而且是断续的。整个空间是如此清明透澈，似乎为你打开了洞穿一生的眼界。〔……〕医生坐在桌前，用笔尖蘸着墨水，边想边写。（179-80）

这段细腻、通透的自然景致的描写表达了日瓦戈心中充溢的无限的生命诗意。大自然是一种可解人意、与人声息相通、心灵相通的世界，它与日瓦戈有着圆融无碍的和谐，透着温情，给他以力量与生命的神力。金秋的“圣母升天节”与其说是深秋、初冬的时节表述，莫如说是一种摆脱世俗混沌，进入“清明透彻”“洞察一切”后的精神状态的呈现，这是日瓦戈医生在前线医院里回应时代情绪，进行诗歌创作时拥有的一种神圣状态，是他与永恒世界之间时而出现的一种神秘的精神呼应。他既有兼济天下的博爱之心，又在潜意识中对文学之乡心怀感念，聆听抵达精神深处的絮语，以此获得生命的超越，抵御外在世俗人生的纷扰，达到心灵疗救的目的。这里，“圣母升天节”不仅承载了自然时间的意义，更成为人物心灵状态的一种表征。在日瓦戈看来，人类最伟大、神圣的精神状态始终与宗教精神联系在一起，而艺术想象与文学创作是这种精神的具象与外化。

除了日瓦戈，小说的女主人公拉拉生命中的重要节点也都发生在宗教节日里。正是在1911年“圣诞节”那天，拉拉做了一个重大的决定，她要“自

己去过独立而孤单的生活”（74），也正是在“圣诞节”这个在东正教中具有特殊意义的节日的夜晚，她才决计开枪打死凌辱她的科马罗夫斯基。这意味着，拉拉在沉沦的羞耻与忏悔中开启了新的生活和新的生命，一个人世间的受难者“抹大拉”苏醒了，一个真正的人复活了。

与圣母节、圣诞节、圣母升天节等节日相较，俄罗斯东正教中的“复活节”似乎有着更为深刻的宗教意蕴。它一次次地出现在小说人物的话语和叙述者的叙说中，在小说中形成了独特的“复活节时空体”，在构建小说的宗教文化图景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日瓦戈被游击队劫掠的日子，恰恰在复活节的前夕。“冬季将尽。复活节前的一个礼拜，大斋的结尾”，游击队员在前往宿营地途中的驿道上见到了一个修道院，入口处拱门的圣像周围有一圈金字，上面写着：“欢乐吧，有生命力的十字架，不可征服的虔诚的胜利”（304）。然而，不无讽刺的是，爬上圣十字钟楼找敲钟人的男孩们发现，下面房屋墙上贴着的是“最高统治者颁发的征收三种年龄的人入伍的命令”（304）。“不可征服的虔诚”并没有胜利，“有生命力的十字架”并不能保护人类免除各种野蛮与动荡。这是革命的使然，抑或是信仰的失落？这十字架是诅咒，还是祝福？在“复活节”的背景下征兵场景的呈现更使这一命题得到了强化：

库捷内镇里正欢送征募来的新兵〔……〕这项工作由于过复活节停顿了一段时间〔……〕这是复活节来得特别晚而早春又来得特别早的节后的第三天，温和而宁静。库捷内镇的街上，一张张款待新兵的桌子摆在露天里，从大路的那头开始，免得妨碍车辆通行〔……〕桌上铺着垂到地面的白桌布……大家合伙款待新兵。款待的主要食品是复活节剩下的东西，两只熏火腿〔……〕（316）

作者有意在节日与反节日的对立中进行对比描写，以此表达信仰与祛信仰的思考：一旦远离了上帝这一伟大的信仰所在，世界便会被混乱与血色所弥漫。“革命”在“复活节”的圣十字镇成了一个不无邪恶的形象。

宗教节日不仅是《日瓦戈医生》前16章的散文¹部分，也是第17诗章主要的时空坐标，或者说永恒的精神坐标。诗章是诗人日瓦戈沉湎于诗歌创作的个性化阶段，既是他在现实人生中获得神性关怀的延宕，也暗示着他文学救赎之梦的复活。诗章中出现的“复活节前七日”“复活节”“圣诞节”“受难之日”“救主节”“基督变容节”等宗教节日不仅承载着宗教节令意义，还成为诗人日瓦戈将“神性”化为“诗性”，将文学救赎与神性启示相融合的方式。他以宗教的文化视角关注和审视人类的精神生活，守护信仰和生命

¹ 本文中“散文”一词，系指长篇小说中非诗歌的文字部分，即除第17章《尤里·日瓦戈的诗作》之外的前16章。

的永恒价值。

帕斯捷尔纳克把宗教节日看作是造物主对人类生命存在的刻意安排，是借助于生命的不同时刻对基督精神的认知来揭示生命行进和价值意义的一种独特的神性建构。在作家的眼中，上帝不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通过这些具体的宗教节日他变得可感、可悟，使人在一个特殊的时间和场合获得一种“心悟”，生发一种“心问”。他把宗教节日视作是人感知基督存在，与其进行心灵交往的神圣时刻，是人超越尘世获得生命超越的“精神节日”。这些节日给予了人们感悟宗教精神的一个时间、机遇、节点，让人们在日常的经验世界中感悟到它的存在，得到它的荫庇、告诫、启迪，思考关于人以及人生命的箴言。在纷扰不堪的现实世界里，这一个个“精神节日”是让人们超越生存苦难、获得自我认知和内心宁静的重要方式。

二、“天启、神示”的生命与大自然意象

所谓“天启、神示”，是指生活、生命、自然、世间万象的奥秘，不仅要通过人的生命感知来觉察，还需要靠感知以外的某种神圣存在的启示来把握。在对生命、大自然的理解中，作家通过基督教的关怀视野，试图以神性信仰来填补人性信仰的破灭，揭示自然界的神圣规律，并试图从终极关怀的角度解决宗教希冀与现实异化之间的矛盾，实现自我及人类的救赎。这是小说神性伦理的另一个重要表现形式。

小说文本中叙述者有这样一段话：

人们日复一日地操心、忙碌，被切身的利害所驱使。不过要不是那种在最高和最主要意义上的超脱感对这些作用进行调节的话，这作用也不会有什么影响。这个超脱感来自人类生存的相互关联，来自深信彼此之间可以相互变换，来自一种幸福的感觉，那就是一切事物不仅仅发生在埋葬死者的大地上，而且还可以发生在另外的某个地方，这地方有人叫作天国〔……〕（13）

正是来自天国的“天启、神示”才使人对生命和宇宙产生一种超越现世的神圣且真切的感知。小说中，面对在现实生活中众多无法参透的思想，作者常常会采用另一种不无神秘的方式来表达。这种感悟既是此岸的，是人对现实存在的感悟，但似乎更像是彼岸的，因为它们涉及到的是另外一个超越俗世的神圣世界。

小说中，望着从列车上跳下去摔死的日瓦戈的父亲，季维尔辛娜说，“人的命运都是生来注定的……天主要是让他生出个什么傻念头，就一定躲不开〔……〕”（15）。这个上了年纪的寡妇是小说中第一个认定人命是天定的女人。

“活在世界上真是奇妙！……不过为什么又要常常为此而痛苦呢？当然，上

帝是存在的。不过，上帝要是存在的话，他就是我”（18），这是刚刚十三岁的尼卡的遐思，他以儿童的天真思考揭示了“上帝就是我”，即上帝就是我的精神依存的思想。他向晃动的杨树发出“上帝”的停止指令后，杨树居然立刻“顺从地”一动不动了。让大自然听命的儿童游戏，讲述的是有了上帝信仰的人的无所不能。作者通过这两个看似无关紧要的人物提出了上帝存在并将智慧与力量赋予人类的命题，道出了“天启”“神示”对生命存在的神秘性和重要意义。人性中的“神性”即“灵性”，这种“神性”并非虚无，是人在对一种伟大真理的真诚信仰中通过对存在本体的感悟而获得的。

生命与大自然是小说中天启、神示的两个核心意象。在作家看来，人是最为关切“生命如何可能”这一本体论问题的生命存在，而且总会在宗教的审视中表现出一种超越的意向与姿态。米兰·昆德拉说，“小说审视的不是现实，而是存在。而存在并非已经发生的，存在属于人类可能性的领域[……]”（昆德拉 54）人对自身生命存在的感知使其认识到需要努力创造更美好、更和谐的“可能世界”，这时他常常会有一种无形的“神灵”莅临的体验。帕斯捷尔纳克认为，以基督为标志的这种神灵恰为个体的自由、美好、幸福的充分实现提供了一个形而上的前提，作家正是在这样的文化前提下表达了主人公以及小说中其他人物对生命、自然的思考。

生命是什么？生命是世界神秘的基原，它在冥冥之中支配着人与世界，又在冥冥中无尽地绵延，它既没有社会性，也没有历史性，是本源与永恒。在瓦雷金诺，日瓦戈发现妻子受孕后，在札记中写道：“但先前完全置于她控制之下的外表，现在脱离了她的监督。她受到她所孕育的未来的支配，已经不再是她本人了[……]只好听其自然了”（277）。妻子的怀孕引发了日瓦戈关于生命的思考。他把新生命的孕育和诞生看作极为神圣的事情，认为这是永恒之天道支撑下的人伦道德的体现。其伟大的人伦道德在于，新生命的孕育不仅是自然规律的使然，更是一种超越人自我的神迹的显现。“孕育”是生命永恒的象征，所以日瓦戈赞美这种生命规律。在他看来，女性“每次受孕都是贞洁的，在这条与圣母有关的教义中，表达出母性的共同观念”（278）。这是帕斯捷尔纳克对生命之神圣、伟大、不朽与上帝息息相通的理解，是他对人的生命行为的终极关怀。

望着产后的妻子，日瓦戈再次陷入了对生命与死亡关系的深刻思考：“她高高地躺在产房中间，仿佛港湾里刚刚下碇就已卸去了重载的一艘帆船；它跨过死亡的海洋来到了生命的大陆，上面有一些不知来自何方的新的灵魂；它刚刚把这样一个灵魂送到岸上，如今抛锚停泊，非常轻松地歇息下来；和它一同安息的还有那折损殆尽的桅樯索具，以及渐渐消逝的记忆[……]”（101）这是日瓦戈对孕育新生命的母性的赞美，是他对新生命诞生的遐想，更是对生命与死亡关系的深思。生命是对死亡的否定与超越，也是亡灵得以在新生命中获得永恒的一种验证。死亡因重生而美丽，灵魂因永恒而伟大。

帕斯捷尔纳克的妻子吉娜依达曾回忆说，“他（指帕斯捷尔纳克——笔者注）把宇宙视为最高起源，并把大自然奉为某种永恒和不朽的东西〔……〕”（帕斯捷尔纳克，《追寻》121）作家笔下塑造的主人公亦是如此，哲人日瓦戈在宇宙中寻求神谕的生命真理，诗人日瓦戈在大自然中寻求神谕的诗性话语。这是一种以非神学方式表达的宗教精神，即对大自然和宇宙存在的一种形而上的价值重估。在动荡的社会时局中，人的心灵需要抚慰、情感需要寄托，大自然总是以其清新淳朴、知解人意的灵性鲜活地出现在经历一场场浩劫的日瓦戈的面前：“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从童年起就喜欢看夕阳残照下的树林。在这种时刻，他觉得自己仿佛也被光柱穿透了。仿佛活精灵的天赋像溪流一样涌进他的胸膛，穿过整个身体，化为一双羽翼从他肩胛骨下面飞出”（336）。正是大自然中的那道“光柱”，消解了日瓦戈心中的郁结、苦闷。在生活没有着落，自由没有希望的游击队的日子里，正是美好的大自然赋予了日瓦戈生活的信心、勇气与力量，激活了主人公的生命感。日瓦戈凭借大自然获得了“神灵”寓居心中的感觉，凭借神灵依托于大自然的“言说”和人对大自然神灵的“感悟”重新变回了生命的“活精灵”，回归了本真。在日瓦戈看来，只有鲜活、美妙、永恒的大自然才能消释人世间的种种“病态”：与命运攸关的意识形态政治、动荡的社会生活和难能终了的战争。他在札记中感叹道：“啊，有时候真是多么希望能远远地离开这些平庸的高调和言之无物的陈词滥调，在貌似无声的大自然的沉寂中返璞归真〔……〕”（135）。

日瓦戈与大自然交融无间的情形在小说中有着多处表现和描叙。扰攘纷乱的社会时局使他内心备受折磨，常常不能安眠，正是大自然给了他心灵的安宁与抚慰：

他倒在一块铺满金色树叶的小草地上，树叶都是从周围的树枝上飘落下来的。树叶像一个个方格似地交叉地落在草地上。阳光也这样落在金色地毯上。这种重叠交叉的绚烂多彩照得医生眼睛里冒金星。但它像读小字印刷品或听一个人单调的喃喃自语那样催人入睡。

医生躺在沙沙作响的丝一般柔软的草地上，头枕着垫在青苔上的手臂，青苔蒙在凹凸不平的树根上，把树根变成枕头。他马上打起瞌睡来。催他入眠的绚烂的光点，在他伸直在地上的身子上照出一个个方格。他融化在阳光和树叶的万花筒中，同周围的环境合成一体，像隐身人那样消逝在大自然里。（337-38）

大自然从未被纳入社会之中，被动地臣服于人类，它是社会之外的另一个世界，保持着无邪的初心，以其永恒的威严、神性与社会对峙。“医生觉得，在他眼里田野患了重病，在发烧说呓语，而树林正处于康复后的光润状态。上帝居住在树林中，而田野上掠过恶魔嘲讽的笑声”（449）。人类社会“耕耘

过”的“田野”与“上帝居住”的未被人类踏足的“森林”形成了鲜明的对照——“田野没有人照料变成了孤儿，仿佛在无人的时候遭到诅咒。树林摆脱了人自由生长，显得更加繁茂，有如从监狱里放出的囚犯”（449）。当“神性”在现实生活中消失，厄运、灾难来临之时，诗人日瓦戈在大自然的“神启”中追寻渐行渐远的上帝隐去的路径，追寻人类失去的神性精神，以填充生命的意义。“远方闪烁的群星，/无意照亮蜿蜒的路程。/小路盘旋在橄榄山，/脚下水流急湍。/芳草地中断在半途，/后面开始的是银河路。/亮灰色的橄榄果，/要拼命乘风举步〔……〕”（533）。这是日瓦戈在《客西马尼的林园》中描绘的具有隐喻意义的自然景色。

大自然还不断地激发日瓦戈的幻想，带给他曾经的美好与幸福的回忆。“在夏天富饶的大自然中，在鸣禽的啼啭中他仿佛听到死去母亲的声音”（437），他的梦中还不时浮现出拉拉的身影：“拉拉的左肩被扎开了一点。就像把钥匙插进保险箱的铁锁里一样，利剑转动了一下，劈开了她的肩肿骨。在敞开的灵魂深处露出了藏在那里的秘密。她所到过的陌生的城市，陌生的街道，陌生的住宅，陌生的辽阔地方，像卷成一团的带子一下子抖开了”（357）。这是在日瓦戈的梦幻中，神灵以某种不无荒诞的方式显示出他的爱人拉拉苦难的生命历程，是生命与自然息息相通的见证。这种幻觉伴随着日瓦戈的整个生命历程，不断诗化着他的人生。小说中作家对一株“孤零零的美丽的花楸树”做了精细描写，它是最能打动人心的大自然意象之一，也是拉拉的精神象征。花楸树“是所有的树木中惟一没脱落树叶的树，披满赤褐色的叶子。它长在泥洼地中的一个小土丘上，枝叶伸向天空，把一树坚硬发红的盾牌似的浆果呈现在阴暗的秋色中。冬天的小鸟，长了一身霜天黎明般的明亮羽毛的山雀，落在花楸树上，挑剔地、慢慢地啄食硕大的浆果〔……〕在小鸟和花楸间有一种精神上的亲近”（344-45）。花楸树与树上的小鸟是大自然生命真实、美丽、自由、爱的象征，是一种未被玷污、侵蚀的伟大的生命力量，永不凋谢的自由生命的精灵，包蕴着强烈的“反变革文明”荒漠的文化蕴涵。

帕斯捷尔纳克通过诗人日瓦戈对天启、神示的生命、大自然意象的感悟，揭示了个体与社会存在的渊藪，实现了个人命运的深沉探寻，展示了个体精神的皈依，表达了对顺乎自然的生活方式与生命价值的高度肯定。如果说，社会动荡正在使人远离大自然，远离自然的生活，那么心灵贴近大自然的日瓦戈的生活与生命存在方式则在呼唤人们亲近、融入大自然。否定俗世现实而代之以天启、神谕的生命与大自然意象来表现个体的灵魂追索，是帕斯捷尔纳克小说的重要写作图式。

三、“复活”意识

从日瓦戈母亲的死到日瓦戈本人和拉拉的离世，小说首尾一致，讲述的是充满深刻的生命悲怆和精神悲怆的“死亡”，从前16章的散文文本向第

17章诗章文本的体裁转换使这种悲剧精神走向了更高的“诗性”层次。然而，在这一悲剧精神之下隐藏的是一种“复活”“永生”的伦理精神，强大的“复活”意识使小说的悲剧氛围获得了一种崇高的希望。

小说中有三次重要的“死亡叙事”，但每一次对“死亡”的描叙中始终不重在对死亡场景本身的展示，而重在死亡触发的对生命本质和灵魂永恒的启示，是反复强调的深邃的灵魂“复活”意识。

小说第1章第1节讲述的是日瓦戈母亲的去世。死亡叙事是从送葬队伍的行进仪式开始的，人们唱着“永志不忘”的圣歌，圣歌是对死者的“永恒记忆”，讲述的是人由肉体生命走向永恒阶梯的生命之级，是生者对死者在世间“存在”的记忆。“人们的脚步、马蹄、微风仿佛接替着唱起这支哀悼的歌”（4），整个世界都仿佛加入了这场安葬仪式中。葬礼即将结束的时候，小尤拉没有说话，“这孩子扬起头，从高处失神地向萧瑟的荒野和修道院的尖顶扫了一眼”（4）。从“萧瑟的荒野”到“修道院的尖顶”，那是人的灵魂从人间走向天堂之路。幼小的尤拉已经有了一种对死亡的神秘、朦胧的感觉。他觉得“那高不可攀的上天低低地垂下来……这时，天上的星辰化作无数的神灯〔……〕”（84）。这是他对肉体生命结束之后灵魂升天的一种遐想，他期待着死去的母亲能在天国获得安宁。显然，作家的“死亡叙事”并非重在描写死亡场景本身，而是表达生命能复活、灵魂能永存的希冀。

小说的第二个“死亡叙事”讲述的是日瓦戈的岳母安娜·伊万诺夫娜的死。在岳母死前，日瓦戈向她讲述了一席关于死亡、复活、灵魂、生命永恒的话语。

“同一个千篇一律的生命永远充塞着宇宙，它每时每刻都在不计其数的相互结合和转换之中获得再生〔……〕

“〔……〕在别人心中存在的人，就是这个人的灵魂。这才是您本身，才是您的意识在一生当中赖以呼吸、营养以致陶醉的东西。这也就是您的灵魂、您的不朽和存在于他人身上的您的生命〔……〕

“圣约翰说过，死亡是不会有的，但您接受他的论据过于轻易了〔……〕死亡是不会有的，因为这已经见到过，已经陈旧了，厌烦了，如今要求的是崭新的，而崭新的就是永恒的生命。”（65-66）

日瓦戈的这番话语像是神父的安魂之曲，抚慰着即将死亡的岳母的灵魂。他要向岳母表达的思想是：人的生命不只以肉体的形式存在于自然界中，它还以精神的形式存在于另一个彼岸世界中。人的肉体会衰亡，但精神和灵魂会永存，因为其美好的思想和善与爱的理念会在后人的身上得以延续、传承、复活。

岳母的死带给日瓦戈的已不像母亲去世时的那种“恐惧与痛苦”，“现在在他已全然无所畏惧，无论是生还是死，世上的一切，所有事物，都是他词

典中的词汇……如今他倾听着安魂祈祷，仿佛倾听对他说的、与他有直接关系的话”（84-85）。和日瓦戈的母亲去世时一样，这里文本中再次提到祝福逝者永生的“安魂祈祷”。此时的日瓦戈已经领悟了超越死亡的永生、战胜死亡的复活的涵义。他独自一人走在送葬队伍的前面，他比任何时候都清晰地领悟到必须要“付出辛劳，要创造出美好的事物”，因为伟大的艺术的作用就在于“探索死亡、创造生命”（87）。这是日瓦戈对生命永恒的哲学认知，对灵魂不朽的诗性把握，他一生都努力用艺术创作探索如何战胜死亡，获得新生。可以看出，对岳母死亡叙事在于表现主人公对生命与永生力量的探索。

小说第三个“死亡叙事”在第15章的“结局”，讲述的是主人公日瓦戈自身的死亡。这是小说中唯一一处有具体死亡场景的叙事，但也只用了几行字的篇幅。然而，悼念日瓦戈亡灵不朽的叙事却延续了整整4个小节，对日瓦戈的死亡叙事仍重在对其复活精神的挖掘。日瓦戈死后躺在“一只凿得很粗糙的独木舟”里，这只独木舟象征着《圣经》“创世纪”中的“诺亚方舟”，暗喻着日瓦戈虽然肉体消亡，但他的爱的诺亚方舟会使生灵免于灾难，灾难终将过去，生命将会复活。棺材周围堆满了鲜花，“鲜花不仅怒放，散发芳香，仿佛所有的花一齐把香气放尽，以此加速自己的枯萎，把芳香的力量馈赠给所有的人，完成某种壮举”（471）。如同这些鲜花一样，日瓦戈将爱的芬芳无私地馈赠给了世人。他去世后，留给他的青年时代好友戈尔东和杜多罗夫的是一种无尽的思念与牵挂。日瓦戈忠实的信仰选择与两位好友信仰的失落印证着人类终极体验上显性的皈依与隐性的摇摆之间的差异。戈尔东和杜多罗夫通过阅读日瓦戈生前创作的作品开始慢慢理解这位昔日的好友，日瓦戈的精神也将会在他们以后的生命进程中得以显现。“尽管战后人们所期待的清醒和解放没有伴随着胜利一起到来，但在战后的所有年代里，自由的征兆仍然弥漫在空气中，并构成这些年代唯一的历史内容。已经变老的两位朋友坐在窗前还是觉得，心灵的这种自由来到了，正是在这天晚上，在他们脚下的街道上已经能感触到未来了，而他们自己也步入未来，今后将永远处于未来之中……而他们手中的这本书仿佛知道这一切，支持并肯定他们的感觉”（493）。

需要指出的是，日瓦戈的离世只是散文部分的结局，而小说是以第17章《尤里·日瓦戈的诗作》真正结束的。作家以这种方式表明，日瓦戈的肉体虽然寂灭，但他的精神和思想会通过他的艺术创作一代代传承下去，他留下的精神财富使他得以永生于民族的、乃至人类的精神世界中。

小说中除了男主人公日瓦戈的人生命运，女主人公拉拉的人生遭际也包蕴着强烈的“复活”意蕴的艺术创构。拉拉饱尝生活的苦厄与艰辛，受尽屈辱和磨难，她走的是另一条灵魂的复活之路。与日瓦戈不同，“拉拉并不信奉宗教，也不相信那些教堂仪式。但为了承受生活的重压，有时也需要某种

内在的音乐的陪伴。这种音乐并不是每一次都能自己谱写的。它是上帝关于生命的箴言，拉拉到教堂正是去哭它”（48）。拉拉以个体平凡生活的“常道”来验证伟大基督精神的“常理”，以人世间的真善美的行为实现灵魂在天国的永恒。如同日瓦戈一生受到舅舅韦杰尼亚平的精神指引一样，拉拉也有一位精神导师——虔信宗教的西玛。西玛是昔日神父韦杰尼亚平的崇拜者，民间宗教思想的代表。拉拉在乌拉尔期间，常常聆听这位思想深邃的智者讲述《圣经》。这位看似平凡的女性身上透露出一种不平凡。她曾对拉拉讲述抹大拉的马利亚。

“使我一直很感兴趣的是，为什么就在复活节的前一天，在临近耶稣的死和他复活的时候提到抹大拉的马利亚。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然而在同生命告别之际以及在生命复返的前夕提到什么是生命，却是非常适时的。现在您听着，《圣经》中提到这一点时是多么真诚坦率啊[……]

“[……]她乞求主道：‘请解脱我的责任，像解开我的头发一样。’意思是说：‘宽恕我的罪孽，就像我散开头发一样。’渴望宽恕和忏悔表达得多么具体！手都可以触到。”(399-400)

西玛的这些话其实是对拉拉精神复活之路的注释。这位“抹大拉的马利亚”在圣诞节告别了罪恶，在动乱的社会现实中远离时代政治，以个人在生活中的坚韧操守来对抗强大的历史，最终通过“忏悔”的方式获得了重生。使她与日瓦戈结合在一起的主要原因是“享受共同塑造的世界，他们自身属于整幅图画的感觉，属于全部景象的美，属于整个宇宙的感觉”（478）。他们回到了世界的原初状态，获得了灵魂的永生。

在诗歌《忏悔的女人》（之一、之二）中日瓦戈以拉拉的原型——抹大拉的马利亚的口吻描绘她的复活：

死神入夜就要光临
这是我一生的报应。
[……] (530)

节日前都在清扫，
我离开这嘈杂与喧闹，
用一桶尘世的水，
洗濯你的双脚。

我找不到床下的软靴，
只因两眼噙满了泪水，

还有那散开的发卷，
遮在我眼前。

[……]

经过这样的三昼夜，
抛落到无涯的虚空，
而在这可怕的间隙之中，
我要为复活而重生。(531-33)

与抹大拉的马利亚在耶稣面前的真诚忏悔得到了主的原谅一样，拉拉的虔诚、忏悔、精神圣洁也得到了“人间基督”日瓦戈的充分理解与高度赞美。拉拉尽管失足，曾深陷情欲的泥沼，但却一直保持着灵魂的高洁。她不仅是饱受苦难的俄罗斯母亲的象征，更是日瓦戈心灵的依托，信念的源泉与生命的力量。日瓦戈在诗中用抹大拉的马利亚的复活暗示了拉拉的精神复活。

如果说小说的前16章讲述的是日瓦戈在人间的生活与生命存在，那么小说第17章《尤里·日瓦戈的诗作》则是日瓦戈在天国的存在。日瓦戈始终认为通过艺术创作可以探索死亡、创造生命，以此获得精神的永生。诗章是日瓦戈以诗性的智慧言说生命不可言说的“神圣”和基督精神的“不朽”，实现自我的心灵救赎，获得精神与灵魂永恒的方式。日瓦戈完成诗歌创作的一瞬间已然“复活”，成了耶稣的代言人。他一生追寻真理，从未摒弃众生的心灵，他俯视熙熙攘攘、充满动乱纷争、罪恶屠戮的人间，成为一个洞烛幽微的灵视者，真善美的忠实的守望者。他通过诗歌获得灵魂的“复活”，从而让耶稣爱的精神与信仰在人世间继续传播。

诗章中的《复活节前七日》一诗描述了对复活的渴望：“四周仍是夜的昏暗，/时光还是这般的早。/苍穹悬挂星辰无数，/颗颗如白昼般光耀。/若是大地有此机缘，/梦中迎来复活诗篇。/……面对复活更生伟力，/死神也要悄然退避”（495-498）。这首诗描写的是耶稣复活前大自然千年的沉寂，通灵的大自然为基督感到悲伤，日夜等待着死亡被复活的力量战胜，期盼着耶稣的复活，最终这一理想得以实现。

整个诗章的最后一首诗《客西马尼的林园》是诗章和整部小说的结束点，是直接通过耶稣的口吻传达出的强烈的“复活”意识：

生命的诗篇已读到终了，
这是一切财富的珍宝。
它所写的都要当真，
一切都将实现，阿门。

请看，眼见的这些，
 都应验了箴言，
 即刻就会实现。
 为了这警喻的可怖，
 我愿担着苦痛走向棺木。

我虽死去，
 但三日之后就要复活。
 仿佛那水流急湍，
 也像是络绎的商队不断，
 世世代代将走出黑暗，
 承受我的审判。(535)

复活的意蕴渗透在男女主人公生命叙事的始终，为整部作品设立了灵魂超越的维度。日瓦戈与拉拉的悲伤、彷徨、苦难不仅仅是两个个体的苦难，而是一代知识分子的存在苦难。然而他们没有被时代潮流裹挟，而是始终坚守个人的信仰价值。回溯其生命之旅，我们不难看到他们的灵魂求索，朝圣与悟道，感受到一种伟大精神的复归。

《日瓦戈医生》起初被帕斯捷尔纳克命名为：《死亡是不会有的》(Смерти не будет)，因此，它也被称作是一部关于“永生”的书。对灵魂永生的向往，对每个个体的博爱之心——这一基督精神是小说终极的艺术追求。俄罗斯著名文学批评家巴耶夫斯基在《重读经典：帕斯捷尔纳克》一书中指出：“它(指《日瓦戈医生》——笔者注)之所以震撼了全苏联、全世界，是因为它以一种毋庸置疑的，对每个人宽容而温暖的基督的爱，以及非国家化的、以个人生活为基础的每一个个体绝对价值的思想来与……邪恶、嗜血……相抗衡”(Баевский 65)。

帕斯捷尔纳克创作《日瓦戈医生》的最终目的不是书写时代的政治斗争，也不只是呈现社会动荡时期外部生活的复杂、多变，他更为关注的是宗教感化对人精神世界的深刻影响，或者说更注重信仰对个体精神人格的重塑。面临神位本体早已坍塌的时代语境，需要为无根漂浮的人们提供超功利的诗学对照和灵魂救赎。这与帕斯捷尔纳克自身的苦难记忆有关，苦难记忆带给他的疼痛感纠缠着他的灵魂，使他的创作拥有了一种“终极关怀”的宗教神性伦理的向度。法国宗教思想家薇依说，“凡是在我们身上唤起纯净真实的美的感情的东西中，必由上帝在场……第一流的艺术在本质上都是宗教的”(薇依 155)。

从耶稣基督到大自然荒野，帕斯捷尔纳克的宗教神性伦理寄寓着“回归

精神家园”的创作意向。《日瓦戈医生》的作者所逼视的，恰是苏联文学数十年来所避讳的，作家借此试图追回一种俄罗斯文学雄浑的神性“魂灵”，通过这种“寻根”达到人生体悟的超拔，人文思想的深刻。

Works Cited

- Баевский В.С. *Перечитывая классику*: Пастернак. М.: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МГУ, 1997.
 [Baevsky V.S. *Re-reading the classics: Pasternak*. Moscow: Moscow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7.]
- 卡尔维诺：《未来千年文学备忘录》，杨德友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
 [Calvino. *Six Memos for the Next Millennium*. Trans. Yang Deyou. Shenyang: Liaoning Education Press, 1997.]
- 昆德拉：《小说的艺术》，董强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
 [Kundera. *The Art of the Novel*. Trans. Dong Qiang. Shanghai: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2011.]
- 马尔库塞：《审美之维》，李小兵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
 [Marcuse. *Aesthetic Dimension*. Trans. Li Xiaobing. Beijing: Living · Reading · New Knowledge Joint Publishing, 1989.]
- 帕斯捷尔纳克：《人与事》，乌兰汗、桴鸣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1年。
 [Pasternak. *People and Things*. Trans. Wu Lanhan and Fu Ming. Beijing: Living · Reading · New Knowledge Joint Publishing, 1991.]
- ：《追寻》，安然、高韧译。广州：花城出版社，1998年。
 [— . *Pursuit*. Trans. An Ran and Gao Ren. Guangzhou: Huacheng Publishing House, 1998.]
- 薇依：《重负与神恩》，顾嘉琛、杜小真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
 [Wei Yi. *burden and grace*. Trans. Gu Jiachen and Du Xiaozhen. Beijing: China Renmin UP, 2005.]